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党史通讯

1986年合订本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党史通讯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陈云廖承志林丽韞关于追认翁泽生为烈士的建议
胡绳谈党史编写问题
在中央苏区（李维汉）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综述（陈欣德）

1986 1

本刊1987年度征订启事

本刊现已开始1987年度的征订工作。1987年《党史通讯》除了继续刊登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党史工作的指示和意见外，将着重刊登党史研究工作的成果、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党史资料，以及党史专题研究综述；各地党史工作的情况、动态，也将继续予以报道。本刊辟有“党史研究”、“党史资料”、“专题研究综述”、“回忆录选登”、“史实考证”、“党史文摘”、“译文选登”、“国外学术动态”等栏目。本刊宗旨是：提供信息，交流经验，反映成果，以推动党史工作。

本刊全年定价6.20元(含邮费、银行手续费)。订阅20份至50份另加挂号费1.50元，51份以上者，每50份加挂号费1.50元，不满20份者一律平寄。欲订阅者，请将款如数通过邮局或银行汇来，并请同时将订阅单及投递标签一同寄来。订阅单已发出，如未收到，函索即寄。联系地址：北京市一九二四信箱发行科，电话28.5471转492。

本刊增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论文选辑》征订启事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召开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第四次学术讨论会，着重研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我们拟从提交会议的论文中选出十几篇编印成集，作为《党史通讯》增刊，内部发行。全书共十五万字左右。本书每本定价1.12元(含邮费、银行手续费)。已订阅《党史通讯》的同志，需要此书，请另订。征订单函索即寄。联系地址同上。

党史通讯

(月刊)

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
(总第一一四期)

编辑者 党史通讯编辑部
(北京一九二四信箱)

印刷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一工厂
发行者 北京市一九二四信箱发行科

每月二十五日出版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党史通讯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总第一〇三期)

(月 刊)

☆ 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

目 录

陈云廖承志林丽韞关于追认翁泽生为烈士的建议 (1)

回忆我的父亲翁泽生 林 江 (2)

胡绳谈党史编写问题 (6)

回忆录选登

在中央苏区 李维汉 (11)

周恩来在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理论贡献 陈国权 (15)

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二大 肖超然 (19)

· 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综述 ·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综述 陈欣德 (25)

党史资料

张国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创者

和拥护者吗? 李云龙 (31)

译文
选登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

..... [苏]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著 周祖羲译 李玉贞译校 (37)

· 党史信箱 · 八万六千余人的说法是正确的 齐德学 (42)

【学术讨论会简介】 闽粤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学术讨论会简介 黄剑岚 (43)

国外新
书介绍

苏联新闻社出版《军国主义日本被粉碎和苏联在

亚洲的解放使命》 振 良 (44)

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一九八六年工作要点 (36)

党史文
摘

陈丕显谈对项英的评价问题 (45) —— 许涤新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的公布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提出 (45)
—— 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对武装斗争的贡献 (46) —— 试论抗日战争史
上限问题 (46) —— 抗战时期日本对华诱和经过 (47)

简 讯 (48)

陈 云 廖承志 林丽韞

关于追认翁泽生为烈士的建议

编者按：翁泽生同志是台湾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者和组织者之一，是我国工人运动的重要活动家。但他的事迹却很少为人所知。1975年10月4日，陈云、廖承志、林丽韞同志联名向中央组织部写了建议追认翁泽生为烈士的信。中央组织部查阅了翁泽生同志的档案后，于1976年1月3日给陈云同志回信说，党在历史上已承认翁泽生同志为烈士，可以不再办理追认烈士的手续。为了褒扬先烈，加强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宣传，经陈云同志同意，现将陈云、廖承志、林丽韞同志给中央组织部的信在本刊发表，同时刊载翁泽生同志的儿子林江同志《回忆我的父亲翁泽生》一文。

中央组织部：

我们三人看过翁泽生（翁廷川）的材料，建议中央组织部审查并追认翁泽生同志为烈士。理由如下：

（一）翁泽生同志的一生是共产党员战斗的一生。翁泽生同志在加入党之前，就在台湾组织抗日运动，被日本帝国主义当局通缉。他到上海后，参加上海大学学习，并在那时入了党。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北伐军进入福建前后，翁泽生同志在漳州、厦门地区参加建立党的组织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初当过闽南特委的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八年参与建立台湾共产党，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留沪负责台共和中共中央的联络工作。一九三二年由广东省委调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的秘书长，直到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捕为止。

翁泽生同志被捕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及管辖下各个机关都完整，没有任何破坏，可见翁泽生同志是坚决的，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了党的组织秘密。他不但没有写过自首书，并且他对熟知的党的政治情况也没有向敌人透露过一句，廖承志证明过这一点，陈云在中央苏区看过上海《申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关于翁泽生国籍问题的报导。上海秘密党与中央苏区有无线电联系，但当时没有收到翁泽生同志叛变自首的电报。一般情况下如有重要干部变节，那时会有密电报告中央苏区。

（二）翁泽生同志被引渡到台湾判刑十三年。在这期间，翁泽生同志在台湾狱中自始至终没有声明“转向”，他还鼓励没有“转向”的台共人员坚持斗争。当有人劝他借口出狱再建台共来实行“转向”的时候，翁拒绝了，并说“我不做火线上的逃兵”。他在狱中遭到严刑拷打，还坚决不屈服，一直到肺结核病严重到日寇监狱的狱医也束手无策，才让他假释出外就医。过了十几天，翁泽生同志就病亡了。可见得翁泽生同志从入狱到病亡的七年间，他不但没有“转向”，或自首叛变，而且对党一贯忠心耿耿，保持了共产党员气节。

（三）关于翁泽生同志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工部局法庭过堂时，他否认了出庭作证的特务们的控告，说他是共产党员、全总党团宣传部长等等以外，突然提出他是台湾籍，因此反对工部局法庭把他引渡给中国政府；当工部局法庭判决把他引渡给日本政府以后，他又声明自

已是台湾人，反对引渡给日本政府。对翁泽生同志突然提出自己是台湾籍的问题，能不能认为翁泽生同志是动摇了呢？或者在坚持共产党员的气节上发生问题了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看。当然，翁泽生同志提出是台湾籍这一点，当时一定有他的打算的。可以设想当时的情况，如果引渡给国民党，那肯定就是枪毙，而且在枪毙之前肯定是封锁一切消息和新闻报导，使同志们无法知道他已经被捕。另一方面，如果引渡到台湾，根据当时不久之前修改了的日本治安维持法，可能判死刑，也可能判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且日本德田球一、市川正一等都还没有判死刑。也可以设想他突然说他是台湾人是另有一种打算，这就是经他这么一闹，新闻上一定会有消息，同志们就可以知道他的被捕，而且有所准备了，后来果然是这样。由此可见，翁泽生同志在审讯的最后关头，提出自己是台湾籍的问题，既不能看是叛变，也不能看是动摇，而应该看是法庭斗争中可以允许的一种策略。因此应该认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四）关于翁泽生同志在台湾监狱中病危，出来以至十九天之后死亡，这一段历史问题。从旁证的材料来看，有一说他出外就医期间，经常有特务监视的，他的家人去看望也是不容易的；有一说是家人可以去看望，但是很少，没有特务在旁监视。但是，写这些信的家人，是由日本统治下的台湾邮政寄出来的，所以即使没有特务在旁，信中也不敢写。此外，在监狱中病危，假释出外，让他死在外面，日寇这种做法，翁泽生同志不是唯一的例子，据旁证中材料，已经发生过好几个先例。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翁泽生同志在十九天期间，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转向”声明，旁证中的材料都是说明他到死还是坚持着共产党员的气节。由此可见，翁泽生同志最后十九天是清白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翁泽生同志在上海被捕前的一段工作，是在陈云领导下的，陈云已经证明。同他共事的还有廖承志，也已做了证明。林丽韞从国内的台湾同胞中做了大量的调查，并提供了可以证实上述几点的旁证材料，现在都附上，请组织部进一步收集翁泽生同志的革命活动史料。

我们三人联名建议，立即追认翁泽生同志为革命烈士，并给予他的国内家属以革命烈士家属的待遇。

陈 云 廖承志 林丽韞

一九七五年十月四日

回忆我的父亲翁泽生

林 江

我的父亲翁泽生，1903年10月14日生于台北市永乐町三丁目。在长期从事地下革命的斗争中，曾化名翁振华、翁定川、陈祥麟、龚聪贤等。祖父翁瑟士，是台北市太平町发记茶行的经理，为人正直，民族意识很强，热心参加反日斗争，给少年时代的父亲以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父亲高小毕业，升入台北市实业学校就读时，日本当局正推行“同化”政策，命令台湾所有的中学都要读日文、讲日语。祖父便毅然让父亲回故乡，到厦门集美中学念书。

在集美中学时，父亲由于受到革命浪潮影响，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尤其是通过人生目的的大讨论，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逐步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在学校父亲满怀爱国热情参加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还和厦门大学、厦门中华中学以及集美中学的台籍学生联合组成闽南

台湾学生联合会。此外，父亲利用寒暑假回台湾探亲，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组织台北青年开展反日斗争。有一次，父亲应邀参加台北太平公学校友会的活动。日本当局规定上台发表演讲不准讲汉语，父亲异常气愤，他故意用台湾话演讲。校长十分恐慌，当即要父亲中断演讲，由于与会者的热烈支持，父亲情绪激昂地坚持讲下去。这件事在台北曾轰动一时，日本警察署称之为“太平公学事件”，并备了案。

1924年7月，父亲在集美中学毕业后，进入被誉为“南方之强”的厦门大学读书。后来了解到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在上海合办一所红色大学即上海大学，父亲为追求革命真理，在厦大读了一学期后便投奔上海大学，就读于社会学系。在瞿秋白等老师的指导下，父亲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时，瞿秋白把课堂教学搞得生动活泼，父亲特别喜欢听秋白同志讲课。在我党的领导下，父亲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斗争意志变得更加坚强，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据母亲叶绿云（又名谢玉叶、谢志坚）生前告诉我，那时瞿秋白很喜欢父亲。1925年，父亲在上海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母亲在父亲的影响下，回到祖国，后在上海艺专读书。由于母亲思想进步，信仰马克思主义，1926年也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12月，父亲为贯彻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精神，开展党的工作，在上海组织旅沪福建（包括台湾）籍学生回乡工作团，赴闽南漳州工作。当时北伐军在漳州设立汀漳龙监察署，监察专员陈卓凡是彭湃推荐的国民党左派，原是广东揭阳县的县长。父亲会见陈专员后，被委以监察署的青运指导员兼北伐军驻漳陆军炮兵学校政治教官，父亲以此公开身份，在漳州和石码地区放手领导革命运动。父亲经常登台发表演说，动员民众响应北伐，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后来经厦门党组织负责人罗扬才介绍，父亲结识了漳州进步学生王德、王占春和进步教师季竹安等，并以漳州市立第二师范学校为中心，领导学生和青年运动。年底，父亲在漳州秘密建立第一个共青团支部。翌年初，吸收王德、王占春、许涂森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担任中共漳州支部首任书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漳州地区的工农革命运动，迅猛地发展起来了。

同一时期，中共两广区委派罗明到漳州筹建闽南地方党组织。父亲被选为中共闽南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27年3月，党创办漳州工农讲习所，父亲担任讲习所教务主任，负责实际日常工作。当时，讲习所招收一百多名学员，多数是闽南工农运动的骨干。父亲在讲习所还讲授《帝国主义论》、《中国革命史》和《青年运动》三门课程。此外，父亲又自任教官，组织学员进行军事训练。

在讲授《帝国主义论》时，父亲以瞿秋白的《现代民族问题讲案》为基础，讲述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殖民地问题和民族解放运动问题。指出，现在世界上是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作斗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已冲破国界，“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已逐渐变成现实。在讲授《中国革命史》时，父亲明确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国民革命的主要任务。父亲热情地赞颂了为国捐躯的爱国志士，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应当由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

为了让学员读“活的书”，父亲仿效上海大学，也组织学员参加社会上的革命运动。他带领学员上街演讲，组织学员分组下乡，发动工人、农民和学生起来斗争。同年3月10日，特委书记罗明按照中央指示，到福州与中央特派员王荷波研究成立福建临时省委事宜。父亲受托主持特委日常工作。18日这一天，父亲在漳州明伦堂召集五十多个革命群众团体隆重集会，举行纪念巴黎公社和“北京惨案”的活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父亲和特委的其他成员积极制定应变措施，加紧布置漳州各县工作，闽南的党组织因此没有受到重大损失。但由于父亲在漳州公开活动，身份暴露，依照闽南特委的决定，父母离开了漳州，到厦门鼓浪屿，几经周折，回到上海。

当时，革命处于低潮，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父亲与上海党组织接上关系后，化名翁国生、张青春、张平凡、陈祥麟等，在沪坚持斗争，秘密从事工人运动。据说父亲那时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并曾担任过宣传委员。此时，他还到厦门去开展工作。

1928年父亲为创建台湾共产党废寝忘食，花费了心血。“台共”初创时主要由在祖国受教育的台籍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部分留日的台湾共产主义者两部分青年组成。父亲曾在上海组织过台湾学生读书会，联系面很广，因而负担了大量的工作。1928年2月，有关人员先在我家成立“台共”筹备会。会上确定由父亲和林木顺等起草《政治纲领》，父亲还起草《青年运动提纲》。同年4月15日，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一个神父的照相馆内正式成立“台共”党组织。出席者有中共代表彭荣、当年朝鲜共产主义者代表吕温亨和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陈来旺、林日高、潘钦信、张茂良等共十一人。会议主要议程有五项：林木顺致开幕词；中共代表彭荣报告；“台共”政治报告；审议《政治大纲》等；选举成立“台共”中委会。会议还通过了台湾共产党宣言。这个组织最初命名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书记是林木顺。父亲当选为台共中央候补委员。那时，日共在本国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国际遂委托中共领导“台共”。当时，瞿秋白是中共中央常委，主持中央工作，父亲是秋白同志的学生，所以“台共”一大结束后，“台共”中央决定父亲留沪负责“台共”和中共的联络工作。

母亲生前告诉我，“台共”筹备会在我家开会时，母亲抱着我参加了，那时我还是个吃奶的孩子。我是1927年9月出生的。当时，党中央刚刚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父亲对革命充满信心，给我起名“黎光”，意思是黎明的光辉，相信我长大一定能看到胜利。

这以后，谢雪红等“台共”领导人先后回到台湾。由于关门主义的影响，作风不深入，组织发展较慢。中共中央曾通过父亲向谢雪红指出过，还间接地批评了谢的“家长”作风。此后，父亲还参加台共二大新纲领的起草工作。针对当时“台共”存在的宗派主义倾向，父亲曾一再提出，要“台共”成员注意防止和纠正。在领导台湾民众开展反日爱国斗争中，“台共”确实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父亲留沪期间，还以台湾大众时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积极从事恢复和组织工人的斗争，写了许多反映祖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文章，登载在台湾大众时报上，对台湾人民的反日斗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1年秋，父亲担任中央巡视员，从上海乘船到香港，指导广东、广西党组织的斗争。临近中秋节时，父亲在香港参加领导十万同胞打击日商的反帝斗争。此后，父亲巡视了两广的广州、汕头、惠阳、宝安、英德、丰顺、海陆丰、梧州、南宁、横县、灵山等地，考察苏区和白区党的工作、武装斗争和工农运动。那是极为艰苦的岁月，1931年12月28日，两广省委遭到敌人破坏，省委书记谢盛泰被捕，父亲冒着危险于年底从外地赶回，重建新省委，恢复了党的工作。1932年3月中旬，设在香港的地下联络总站受到敌人破坏，我特务队长被捕后叛变投敌，于16日带着敌人预先包围省委开会的秘密地点，父亲和省委的其他同志一起被捕。后因证据不足，父亲被遣回上海。但港英当局暗中却通报上海国民党当局。据母亲说，

父亲十分机警，船到达吴淞口时，父亲发现有敌人跟踪，便示意大家分开躲避，引散敌人。父亲以一百元钱买通了水手，藏在仓库中，没有被发觉，成功地摆脱了敌人的搜捕。父亲脱险后，几经周折，平安到达上海。

回上海后，父亲仍搞工人运动，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这时，父亲化名翁定川、张平凡、陈祥麟等，经常深入基层，巡视、指导各地工人斗争。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日子里，父亲毫不动摇，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33年3月4日，因叛徒出卖，父亲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父亲在上海被捕时已患肺病，但他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始终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巧妙的斗争。那时父亲在上海与陈云和廖承志同志因工作关系经常碰头。但他在狱中没有出卖同志，没有泄露丝毫秘密。父亲牺牲时，陈云曾对我姑母冯志坚（原名翁阿冬）说：“你哥哥知道的事非常多，可是他一句话没有讲。”姑母于1938年经廖承志介绍，从香港到延安参加抗日。为避免连累台湾的亲友，陈云建议她改名为冯志坚。多年之后，廖承志也曾对我说：“当时如你父亲不坚强，我也完了。”同年3月底，父亲被押解到台湾，关在日本监狱里。父亲曾和中共组织谈过，万一被捕，就说自己是台湾人，因当时台湾被日本占领，台湾人都算日本籍，按“治外法权”中国政府不能判台湾人的刑，必须引渡给日本政府。引渡到台湾后，日本人不明案情，比落到国民党反动派手中要好一些。不料父亲被引渡到台湾时，台共已于1931年6月被日本当局破坏，由于台共的秘密早已暴露，日本人对父亲的情况十分清楚，所以他们对父亲更加残酷，把他关在只能躺一个人并只有一个通气孔的狭小牢房里，进行非人的折磨，但父亲始终没有声明“转向”，还鼓励“台共”党员坚持斗争。后来，敌人将父亲秘密判处十三年徒刑。父亲被关在那阴暗、潮湿的独身牢房里，病情越来越严重，据“台共”领导人之一王万得说：当年在台北法庭上，父亲对着敌人说：“我从小就在中国受教育，我将来出狱后，还要去中国参加革命活动。”父亲对生活从来没有失去信心。当时台共曾派人让父亲办个假“转向”手续，以便出狱后重建台共组织。父亲却说：“我的病出狱也治不好了，何必当革命逃兵！”1936年9月，父亲在台北监狱时，母亲曾带我到狱中探望父亲。见面时，父亲知道我在小学只学日语，不能学中文，对此很伤心，当即交代母亲说：“把黎儿送到同安大姑母家去读祖国的书。”这样，我也就回到了祖国大陆。

父亲在台北整整度过了六年的监狱生活。由于敌人的不停折磨，父亲的病情迅速恶化。1939年3月1日，我堂叔翁新英写给我姑母的信中说：“三月一日下午四时假出所（假释），并非因我们要求放出，是因健康忽然不好，刑务所的军医认为没办法……出来后，我去接他，他竟然变成另一个样……马上叫医生诊断。医生说神经和肺伤得很厉害。”3月21日，堂叔又寄来一封信，说他“已在十九日正午逝世”。信上还说：“当时曾叫他‘转向’发誓悔恨，他顽固不从，被再度禁入狱房。”

可尊敬的父亲，他宁死不肯“转向”，表现出一个真正台湾人的铮铮铁骨，也体现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崇高品格。

我们时常以父亲的革命精神鞭策自己，走父亲走过的“光明亮堂的大道”，坚定地担负起革命先烈未竟的事业，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为振兴中华，尽革命后代应尽的责任。



胡绳谈党史编写问题*

一、写党的历史不仅要写做些什么，还要写为什么这样做，这就牵涉到写历史背景的问题

要写出在什么环境下党做出什么决定，这些决定的成败得失，它所提供的丰富经验。当然党史和革命史还有区别，不可能将社会历史背景写得很多，但必要的背景是必须写清楚的。

总结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的事业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我们不可能从民主革命的经验中找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但从民主革命的历史中总结出“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极其宝贵的经验，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这四条原则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的。我们写历史就要向人民写清楚为什么要“四个坚持”，为什么在中国只能由共产党领导，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我们只是描述无产阶级如何领导人民大众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很不够的，还必须说明，为什么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人民争取这一胜利。说清楚这些问题，也不是很容易的。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史看，我们党创立以后，首先领导群众反对的是北洋军阀，这个问题现在没什么人提出疑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同国民党斗了二十二年，其间经过国共合作的八年抗日战争。那么，为什么要反对国民党？为什么要同国民党斗争这么多年，一直到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没有可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国民党统治的全部历史所证明了的。就拿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情况来说，当时中国出现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一种是打仗。实际上不是抗战一结束党就只为打仗做准备，好象一切谈判都是为了打仗，当时我们党确实也考虑过和平建国的可能。如果国共合作建国，在那种情况下，新民主主义的成分就很少了，资本主义的成分就大多了。但就是这样的前途，国民党还是不干，美国也不干。所以只有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条路。现在有些人不了解在中国那种半殖民地条件下不可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如果国民党在1927年以后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那么，共产党的历史恐怕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在党的历史上有几个时期的背景很重要。第一个是党成立时期，为什么国共合作，共同打倒北洋军阀？第二个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社会情况怎么样？国民党的统治是怎样的一个统治？第三个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一系列变动。第四个是抗战结束后。这是很关键的四个历史时期。党成立后这一时期大家提的问题不很多。“九一八”以后的情况复杂，但人们也不大会提出什么问题。倒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两个时期的背景更需要认真分析，做出说明。大革命失

* 本文是胡绳同志于1985年10月23日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党史编写讨论会上讲话记录的一部分。

败以后，不是说我们党因为失败了，需要报复一下。当时的形势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拿起武器，反对武装的国民党反动派。不把这一时期的历史条件说清楚，许多问题都说不清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很复杂，出现了两种前途，有争取和平民主的可能，但也要准备打仗。最后和平不能实现，只有打仗。我说的这四个时期，实际上是国共两次合作，两次分裂。

现在有人提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了。对于到底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还是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说。如果已经独立了，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提出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口号就没有意义了。这一问题粗看起来很荒谬，但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这类问题的提出，反映当前人们的思想很活跃。如果我们不能解答青年人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们写党史书干什么呢？总不能都是为了让这些老年人来回忆过去的光荣业绩吧！还是要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解答青年人提出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提得非常尖锐、非常突出，往往不是很容易就能回答得了的。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就有过一场论战，当时主要回答托派提出的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社会性质是什么？客观环境是什么？这些问题决定革命性质和如何革命。所以对历史背景要交代清楚，要写好。

有人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已经不是半殖民地国家，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已向国民党政府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取消了租界。的确，在1943年1月由英美政府倡议，国民党政府和英美订立新约，规定取消领事裁判权、租界，军舰在中国行驶的特权，使馆地区的驻兵特权，等等。这些新约是取消了一些最露骨的侵害中国主权的殖民地制度，但并没有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而且订立新约的时候，日本已占领半个中国，主要是沿海地区，这时英美在新约中宣布取消那些特权，事实上它们已经无法行使。拿租界来看，最为明显。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本国傀儡汪精卫就把当时还保留着的英国统治的天津、上海等地的租界统统干掉了。所有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租界实际上都到了日本的手里。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把历史好好回顾一下。1927年大革命时收回汉口英租界是第一次由人民力量收回租界。从那时以后的多年间，许多西方国家都感觉在中国的特权地位很不牢靠，如果一切照旧不变，难免引起中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排外”活动。在二次大战后期，老殖民主义的末日已经到来，西方各国当然不可能再在中国恢复租界等制度。美国要统治中国，当然不能完全采用老殖民主义的办法。抗日战争胜利，英美等国不得不在战争期间取消在中国的一些特权，当然是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好时机。问题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否利用这个时机使中国彻底摆脱半殖民地地位。战后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的关系，它们之间订立的条约、协定等等，都说明，旧的不平等条约没有完全废除，新的不平等条约又产生了。如果以为，中国的独立是1943年英美订立新约所恩赐的，那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最近乔木同志主张大学公共必修的政治理论课不讲党史，改讲中国革命史，那样就可以讲得宽一些，多讲一些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我们写党史也还是要对历史背景做一些简要的恰当的说明。

二、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是建筑在科学性的基础之上的，两者是统一的。为什么现在有人觉得好象两者是互相矛盾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果。“文化大革命”把“革命”喊得很响很响，实际上根本不讲道理，哪里还有什么科学性可言？那种“革命性”，

又怎么能算是真的革命性呢？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不能光靠激情，而要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要按照革命本身的规律性来进行革命，按照特定的历史条件、客观环境确定革命的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出现“左”的倾向的原因，就在于脱离了客观历史条件。右的倾向也一样。所以光有革命激情没有科学性不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必须以科学理论为基础。

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批判“左”的那一套东西，批判唯意志论，强调革命性要和科学性统一起来。但最近我看到有些文章，说唯物史观有个弱点，只讲客观规律，忘记了人的作用，忽视人的作用。这是一种误解。革命和建设都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但决不是说一切事情都已由客观规律安排好，不需要人发挥主观作用。如果一切都已经由客观规律安排好，那就和说上帝把一切安排好一样，变成宿命论了。过去就有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宿命论。事实不是这样。人们在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并不是客观规律都恰好注定会导致成功。人们只有在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才能达到既定的目标。革命时期如果党制定的方针、政策总是错误的，不能形成正确的领导，中国革命很难说何时才能取得胜利。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写历史是否既充分说明了客观规律，又充分说明了党的作用，说明党驾驭客观规律的能力。

最近我们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多讲了一点正面战场的情况，讲了国民党军队在对日作战中也作过贡献，等等。这一点国际上也注意到了。这样就听到一些反映，主要是青年同志说，过去不知道还有个正面战场，国民党也打了仗；说过去讲历史掩盖了历史事实，现在才知道了真象。

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1941年以后的评论，包括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确实主要是揭露国民党的对日妥协和动摇，是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日、破坏团结，甚至走向投降的一面，这是必要的。但不等于说，我们党当时就把蒋介石看成投降派。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什么在国民党制造反共摩擦期间，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适可而止呢？我们在同汪精卫斗争时，就没有说过要适可而止，也没有说过“有节”的问题。这显然是把蒋介石同汪精卫区别开了。那时，国共合作抗日已经是既成事实，危险的是蒋介石国民党实行不利于抗战进行到底的反民主的破坏团结的政策，从这种政策可能导致妥协投降。在那种情况下，当然我们不必要大肆渲染蒋介石如何抗战，如何对抗战作了贡献，这是很容易了解的道理。我们党在抗战期间始终认为是存在两个战场的。1945年毛泽东同志写《论联合政府》，明确地写抗日战争有两个战场，而不是一个战场，说1938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把重点从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强调的是“重点”，也不是说蒋介石把“全部”力量都放到反共方面来。毛泽东同志在讲到蒋介石片面抗战的问题还说，片面抗战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只不过这种革命性是不完全的。《论联合政府》中还说，国民党是个复杂的组织，它的主要的领导集团同其他部分是有区别的，“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抗战开始前，我们为什么提“逼蒋抗日”，而不提“逼汪抗日”呢？这说明我们党并没有把蒋介石同汪精卫同等看待。直到皖南事变发生时，中央仍然没有把它看作“马日事变”、“四一二事变”，还是断定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后来写历史时，有些书可能说得简单点，写得不那么实事求是了。如有些书说，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有两次大溃败，这种写法是不合适的。抗战初期从沿海地区撤退不能看成是同1944年湘桂

大溃败同样的性质。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也说道，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面前只能实行战略退却，还考虑到敌人可能占领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当时无论谁来做指挥，也不可能在上海打下去，也得撤退。当然，蒋介石在战略上、战术上是有缺点，有毛病的，又不依靠人民，发动人民力量。如果把这些话说简单了，就会造成印象，好象是我们根本不承认蒋介石在抗战。但这不是我们历来的看法。假如蒋介石根本不抗战，我们怎么跟他合作呢？我们承认他抗战了八年，不等于说我们作的判断，如说他从抗日战争中期起消极抗战就是错的了。实际上在相持阶段能够坚持下来，主要的一条还是有敌后战场，抗战的主力还是我们的敌后战场。这些越是说得科学、准确，完全按事实去写，就越有说服力，人们怀疑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所以，一定要把革命性和科学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写党史要坚持革命的立场，这种革命立场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为基础的。讲科学性不是说要罗列所有的事实，却不能说出事情的本质、事情的规律性，那样是写不出科学的著作的。

三、写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要写出正确的认识如何经过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是逐渐提高的，不可能一开始就提出完善的纲领和策略，不可避免地要有许多曲折。最近我接到一个老同志的信，引起我思考这个问题。他在信中说，回想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马列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必须推翻旧统治，建立新社会，革命分两个阶段，因此我们充满信心去干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久战》告诉我们战争发展的未来，我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到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自卫战争，党中央告诉我们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道理。而现在呢？他的意思似乎是，不大清楚了。我看了这位老同志的信以后很有感触。我想告诉他，你对过去走过的道路说得虽然对，然而省略了许多细节的最概括的说法。中国革命分两个阶段，并不是革命一开始时大家都懂得，而是经过许多曲折才认识清楚的。抗日战争开始，实行国共合作，我们把红五星摘下来了，可是下一步怎么办，抗战胜利后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老实说，当时对许多同志说来，是闹不清楚的。经过多少艰难困苦，经过多少实践上、认识上的曲折才找到正确的道路，而且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认识上来，也有个过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我们取得了成绩，但也犯过错误。我们曾经以为路子弄清楚了，其实是搞错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几年间，实践证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开始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懂得了要从中国的具体条件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固然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的各方面的细节、具体的发展过程，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清楚，但无论如何，总的来说，还是有了个正确的路子。不要看到物价一涨，工资改革有些毛病，还有不正之风，就觉得前进方向有问题了，丧失信心了。就说不正之风吧，我们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难道一直就那么纯洁？就是到了抗日战争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都确立了，你说党就不犯错误，土地改革中间就不犯错误？现在一回想，好象很简单，事前什么都弄清楚了，一下子就胜利了。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现在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还要有共产主义理想，但是怎么走到共产主义，那的确还说不清楚。抗日战争开始时我们对抗战的结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就那么清楚？难道那时就知道，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就能把蒋介石打倒，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哪里有那么清楚啊！

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科学概念，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它反映了我们党的好多年经验

的积累。我记得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在武汉和一些老同志一起讨论抗战的前途，大家也只是模糊地认为，抗战胜利后将导致“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叙述，这个阶段总的来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但许多概念是慢慢地从模糊变得明确起来，从简单变得丰富起来的。这样看来，我们在党史中把道路是曲折的、认识是逐渐发展的这样一种观点写好，是很必要的。对这个问题不仅是青年同志，而且老同志可能也需要重新学习。

把党的全部历史，写成路线斗争史是不好的，但必须讲各种错误倾向。错误倾向不要看成是个别人的问题，当然总有个别人作代表，但它相当程度上是反映党在某个时期的一种思想倾向，反映党的成熟的程度，不是简单的某一个人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有种简单的观念，认为反正谁有错误倾向就是存心破坏革命，故意捣乱。这不能解决问题。当然从一些人来看，有的是认识上的问题，有的是个人品质问题，甚至是有个人野心。我们不能象国外、港台的某些言论那样，说党内斗争就是权力斗争，这是不行的。就是有个人野心，他主观上也不一定是存心破坏革命，这跟内奸不一样。有些错误的思想倾向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难免要产生的，所以有许多人响应，成为一种思潮。象陈独秀的主张，也反映了党还处在幼年的状态，并不是只有陈独秀一个人那样想。

四、怎样看待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

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应该怎么看？建国以后，我们至少在建设中吃过照搬民主革命经验的亏，虽然不是全部照搬，但有些错误确是和照搬老经验有关。最近有个同志对我说，我们现在不能采取搞运动的形式了，但在某种情况下，有些同志有点痒痒，认为还是可以用运动搞一下。我们必须从理论上说清楚为什么在现在的条件下不能搞运动，如果说不清楚，就难免再犯这种错误。他说的是有点道理的。因为说现在不能搞运动，往往是从经验上来说的。许多年里搞运动都搞得不好，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等等。为什么搞运动的办法不好，我们还没有讲出充分的道理来。那么，你从经验出发说搞运动不好，他也可以从经验出发说搞运动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民主革命中不是搞了许多运动吗？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土改运动等等。但民主革命时期那样用几个比较简单的斗争口号去发动群众的经验，看来是不能照搬的。当然，民主革命时期有些基本经验应该吸收，比如党同人民群众结成亲密的关系，从思想上建党等等，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是最根本的经验。民主革命时期搞运动，取得很大的成功，但在运动中也容易出偏差。在那时党号召搞什么运动，同党取得政权以后，特别是在建设时期的情况不同。象五卅反帝运动，那是真正符合群众要求的，即使那样，也不可能把全体人民都动员起来，只不过把相当一部分先进分子动员起来，带动一些中间的。到了党处于执政党地位的时候就不同了。如果党号召搞一个运动，那就谁都会跟着干。不论是不是群众真正要求干和可能干的，都会跟着干。所以民主革命时期与建设时期情况不同，照搬这些经验是不行的。在写过去的革命经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说明党是怎样取得这些经验的，哪些是应该继续接受的，哪些是不应该继续接受的。如果把不该接受的经验过于突出地写出来，那可能是不妥当的。

最近有些同志还说到这样一层意思，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都看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也要看到，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从农村发展起来的，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比较低。由历史发展造成的这一情况，本来应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弥补，但相当长时期忽略了这个问题。我们的革命从农村起来，先有了军队和根据地，一旦夺取全国胜利，

在 中 央 苏 区

李 维 汉

1932年底，我从莫斯科回国。翌年初，我到上海找党中央。李竹声、康生接见了，他们要我留在白区中央特科工作。不久，又要我到中央苏区去。为什么白区被破坏得很厉害，特科工作又缺人，却要我到苏区去？后来才知道，是对我不放心，认为我是靠不住的。4月，我奉命到达中央苏区。

临时中央已于同年1月迁到瑞金。当时，党中央书记是博古，中央组织部长任弼时，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参谋长刘伯承。李德是军事顾问。何凯丰后来是少共中央书记。

我一到中央苏区，很快就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沙洲坝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还对我说，你怎么叫罗迈呢？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毛泽东于1931年11月初在江西瑞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被撤销红军领导人的职务。那时，我对这些事都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人说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任弼时没有对我说这些事。我在莫斯科学习时，也没有听王明等说过。

几天以后，碰上开会（昌）、寻（邬）、安（远）活动分子会议，他们要我参加。我在会场上才知道从2月开始，在福建已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开始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当时罗明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邓小平任江西省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任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任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五师师长，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从实际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正确的意见，抵制“左”的作法。如主张在红军弱小的情况下应向农村发展，不赞成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诱敌深入”，然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不赞成硬拚；主张中央红军、地方部队、群众武装都应发展，互相配合，不赞成用削弱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界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同样的办法；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主张健全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团体；

就有一大批现成的多少有点经验的干部，立刻接收大城市，也有了一套政策，这和俄国革命不同。过去我们在谈中国革命胜利中这方面的优势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在这种优势中又包含着一种弱点。现在在写党史时就要注意这样的问题。

主张根据地的行政、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都由政府负责，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工作。结果，这些正确主张被“左”倾领导者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被称为“罗明路线”。这时，张闻天已从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后回来，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作了反“罗明路线”的报告。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邓小平。张闻天还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会、寻、安地区是苏区的边远地区，是敌人打过来、我们打过去的游击区。但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却认为，失掉了寻邬是中心县委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是执行退却逃跑的防御路线的结果。毛泽东、朱德总结出来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红军最早的战略战术。后来红军和游击队的作战原则，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把它发展为十大军事原则。而反“罗明路线”实际上是批判游击战争十六字诀。那时苏区的边远地区，完全是赤白对立。毛泽东曾经说过，困难的是有中间派反水的问题。因为赤白对立严重，中间派中的不少人反水了。抗日战争时期，在游击地区还有革命的“两面”政权，敌人来时可以应付一下。但当时在边区只有实行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才行。在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上批判十六字诀，我没有讲话。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谈，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被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有两个是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搞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后几十年，我再没有反对过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了。

毛泽东在1931年、1932年被撤销了党的和军队的领导职务后，只有一个实际上被架空了的政府主席的职务。1934年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他也没有参加。毛泽东是遵守纪律的模范。据我所知，他并没有承认自己是犯了所谓“富农路线”的错误，但他服从党的决议。他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时，仍争取在党领导下做一些工作，如在查田运动中，他主持召开了瑞金、会昌等八县的区以上政府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等，这些都是根据中央局作出的决定去做的。他到兴国作调查，写了《兴国调查》报告。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和模范乡、模范村建设，是在他领导下搞起来的，这为中央苏区的巩固打下了基础。他自己曾说过，在这段时期，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拉下你的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最后王明“左”倾冒

险主义失败了，还是请毛泽东出来担任领导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他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他读了许多书，总结了全党的经验。他写的文章，都是气势磅礴的。那时，在正确路线指导下，各方面工作是正确的、蒸蒸日上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王明他们要反对毛泽东呢？为此我还写了一篇笔记。我认为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有毛泽东那么高的威信，所以他们就调兵遣将，派很多人到中央苏区。他们先夺党权，再夺军权。周恩来说：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后来博古等没有让毛泽东出来再担负红军领导工作。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下搞起来的，当然，是集体领导。第四次反“围剿”是在周恩来、朱德同志具体指挥下进行的，虽然毛泽东没有亲自指挥，但红军指战员和地方上的干部、群众还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及战术原则，所以取得了胜利。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威信扫地。他们还准备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换班。其实，当时已经换班了，由张闻天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把毛泽东架空了。毛泽东虽是中央政府主席，但中央和各部的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后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转变了态度，遵义会议上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我到中央苏区时，开始是中央组织部的干事，后来任弼时调到湘赣苏区去了，便任命我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但是我不管军队的组织工作，也不管白区的组织工作和其他苏区的组织工作。我只联系三个省委的工作。一是江西省委，省委书记李富春，妇委书记蔡畅，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副主席陈正人，军区动员部部长陈奇涵，省委机关设在宁都。二是粤赣省委，它是从江西省委分出去的，省委书记刘晓，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我去过粤赣省委几次，没有在那里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三是由兴国等县建立的一个省委，叫什么省委，记不清了。省委书记是朱开铨。福建省委由张闻天联系。

1933年下半年成立中央组织局，主任是我，成员有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同志，他们多数是政治局常委。当时，张闻天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潘汉年是副部长，他不是组织局成员，但组织局开会，他也参加。妇女工作由我兼管。白区工作都是陈云兼管的。贾拓夫是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央组织局每一次开会的议程，除组织、宣传外，都是由张闻天提出，会议结论也由他作。讨论重要问题时博古也出席。讨论查田问题，毛泽东也来参加过。中央组织局是一个畸形组织，会议主席是我，参加的人是常委，而作结论的是张闻天。名义上是我负责，而实际上我只联系三个省委。

我在中央苏区所做的第二件事，是扩大红军。1933年冬开始的扩红工作，全部由我负责。12月，博古通知我说，现在正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我们要扩大红军三万人，明年红五月时完成任务，这个事归你负责。他还说，这是军令状，完不成任务要杀头。这是给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好象完成了扩大三万红军的任务，第五次“围剿”就能粉碎。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整个苏区全部动员了。这时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开过，群众革命情绪很高，这项任务完成得很好，扩大了五万红军。任务完成得这样好，这是以前的正确路线在那里起作用。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配合。当时工会组织了工人师，少共组织了少共师。